

古今医案医论

第二辑



主 审 沈书忠 贾大山
责任编辑 张银耀 贾录山
书名题字 张贵银
封面设计 马世新

正定文史资料第二辑

(内部资料)

大 32 开本 172 千字

正定县新华胶印厂印

印数 1000 册 工本费 10.00 元

1996 年 10 月 第一版

目 录

往事追忆

- 古城春晓 李钟琦(1)
正定城内地下斗争的回忆 李常青(8)
在华大的日子里 吴 田(15)
在正定从事妇女工作的回忆 栗文兰口述
周中菊整理(23)
慈禧、光绪返京途经正定轶事 冯汉珍(31)
我被抓到日本长野当劳工 王庆元口述
贾禄山整理(34)

古迹拾遗

- 正定城区寺庙塔堂辑录 吴清汶(38)
“梁家坟”的变迁 张银耀(51)
河北省的第一座县办公园 樊志勇(57)

正定佛教

- 正定佛教大事年表 郭开兴(60)

巾帼英烈

- 忆我的母亲翟岭歌 魏 光(83)

E023/03

- 机智勇敢的妇女自卫队长陈大姐 徐 玲(89)
“阿庆嫂”式的女联络员——陈银菊 贾俊华(95)

人物春秋

- 忆著名眼科专家——张晓楼 何 玉(102)
我的母亲——马利 马珑珑(120)
忆我的姥姥——马利 李 洁(127)
忆马利 何 玉(130)
哭马利同志 牛锡俊(133)
中医徐竹卿 李钟琦(137)
樊子林与正定文物 牛锡俊(140)
记阿訇底荣斌 贾俊华(145)
张荩臣先生记事 王京瑞(149)

昔日教育

- 正定县区立第二高级小学 乔铭杰口述
张明祥整理(155)
正定县区立第三高级小学 王福增整理(157)
正定私立首善完全小学校 樊志勇整理(160)
忆河北正定师范学校 耿吉红(166)

正定百业

- 正定近代棉纺织业史话 李钟琦(174)

- 近代正定棉花生产、销售及
加工的一些情况 郭开兴(181)
解放前正定的菜籽行业 杨 谦(184)
正定济和堂药店 黎庆印、杜福堂口述
白靖安整理(186)
正定城的浴池业 李钟琦(194)
正定县化工厂史话 李钟琦(200)

艺苑花絮

- 正定“同乐轩”、“正光剧社”始末 王志成(206)
学生意、自强歌 樊志勇搜集整理(214)

古 城 春 晓

李钟琦

话 旧

正定府地处冀中平原，物阜民殷，商贾云集，不仅文化发达，亦乃军事重镇。北魏时，郡县治所移至此地，宋时即有“花工真定府，锦绣太原城”之称。清康熙初年，直隶省会移驻保定，石家庄也因交通方便，在清末民初迅速兴起，正定的工商业，一度略显萧条。但城内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享有三山不显，九桥不流，四塔、八寺、九城楼之誉。还有七中、八师两座著名学府，在文化教育界仍为一方翘楚。军事上与石家庄互为犄角，也居重要地位。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既专横跋扈又腐败无能的慈禧太后，狼狈逃窜，奔避西安。回銮时，芦汉铁路（即现在的京汉路）刚刚修到正定。西太后在正定站登火车回京。按正常情况，皇帝出巡，应驻跸行宫。可是此时正定行宫已圈入天主堂内，皇帝不便进入洋人的教堂，便只好屈尊住到镇台衙门官宅。据传由于战败割地赔款，帝后感到无脸见人，虽然迎接他们的官兵民众人数很多，他们却是竭力回避，不与人民见面。进南门后，经青塔处往东折入镇台衙门。回京时由镇台衙门经东后街，过御路口（在胜利街），出大北门而去。

正定原为府治，民国二年，撤府留县，又晚一点，镇台也撤销。现在的县政府处，是原来的府衙门，正定府尹驻此，解放前已

残破不堪。镇台衙门在东门里街路南，七七事变前已改为八师附小，解放时只剩一片场地了。镇台以下官员是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都司衙门在大十字街西路北，现在的电影院处，解放前是县保卫团驻地。解放时，因年久失修，已坍塌为一片瓦砾。左营守备，驻南仓口，营守备驻卫前小红庙东。养兵需要粮秣，设有南仓和北仓。南仓在今四合街，北仓在木塔东边，现在的梁家角处叫北仓口。大教场在教场庄，北面筑有将台。1932年春，蒋介石曾谎称要建飞机场，抵御日寇，哄骗学生和群众平整场面，将台的大部于此时被摊平，可是飞机却不曾来过一架。小教场在镇台南边，一说在太平庄。

属于府一级的机构，还有常山书院，在现在正定中学院内，院内有大成殿、衡鉴堂、藏书楼等建筑。明伦堂在今城建局院内，府训导（教授）驻此，解放前已成为县立女子小学。正定的府文庙是很有气派的，座落在校门口街路北，主殿名大成殿，东西宽七大间，南北进深五间，殿内正中设置孔圣先师木暖阁，左右两旁是颜、曾、思、孟四大贤的木暖阁；殿前为戟门，戟门前为泮池、石桥、棂星门，棂星门前左右两边有石碑，上刻“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由此再往南有魁星阁、九龙壁；正南面临靠街口设有木牌楼，额题“圣德通天”，东临观前街的木牌楼额题“德配天地”，西邻府墙东街的木牌楼额题“道冠古今”；主殿后面为崇圣祠，内有众多的先贤牌位。清末民初时，每年春二月、秋八月文武官员都要来殿祭孔。

“前寺后寺龙王堂，中间夹着火药房”。火药房旧址在太平街西边，那是镇台制造火药的地方。正定府是北京通往华中华南的大道，设有官驿。原来官驿旧址在开元寺西南边，后来搬到现在的县六中后边操场处，俗名马号。

原正定县衙在民主街路北县六中处，县衙西边是监狱。监狱

西边是典吏(管监狱的官)。县文庙在今常山宾馆内，其主殿是五代时所建，洞五间，进深三间，文庙前也有泮池石桥和魁星楼。魁星楼顶上一层，有一个木雕人像，足登鳌鱼，一手抓书，一手执笔，象征着魁星点元。常山剧院的北侧，有封冻碑，亦名风动碑，全称是“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系唐朝永泰二年所立，碑高约6米，龟趺高2米，碑宽2.4米，碑文刻王士则行书，字体风流潇洒，独树一格。

解放前，正定城区分为四大镇：以大十字街为界，东北角为龙兴镇，是因龙兴寺而得名；西北角为华安镇，是因小北门题额“华安”二字而得名；西南角为阳和镇，是因阳和楼而得名；东南角为广惠镇，是因广惠寺而得名。

春 晓

1947年4月10日正定县城解放后，正定城镇人口包括学生及驻军等约计两万余人，工商企业也具有相当的规模，边区政府把正定城划为市，目的是以此为试点，取得管理城市的经验。

1947年底，市辖四个区的建制撤销，将城关划分为民主街、常胜街、解放街、大众街、胜利街、太平街、西北街、西南街、四合街、生民街、东门里街、北门里街、西门里街、车站街、北关街、西关街、南关街、东关街、顺城关、五里铺(包括树林)等20条街，前5条街为商业街，后15条街为农业街。

1948年市委书记任克文，市长郭丕基，副市长杨毅。市政府下设民政科、教育科、财政科、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还有民众教育馆。

正定市虽是城镇，但居民的大多数从事农业，因此，土地改革仍是最主要的革命目标，从1947年冬季至1948年底，完成了

土改任务，1949年春填发了土地证。中心街则扶持工商业恢复和发展。干部们认真学习了党的政策。民族工商业者是团结对象，小商小贩是劳动人民，都属于保护范围。当时的正定，还处在农民个体经济的海洋中，十天中逢二、七大集，五、十小集，农民进城推销农副产品，购置生产、生活资料，贸易范围远及新乐、行唐、灵寿、藁城等地。粮食市、花布市、牲口市、猪羊市等很快恢复了繁荣热闹的景象。自解放至1949年3月市县合并归县建制。城中情况概略如下：

工业及手工业：解放初期，正定原有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国营企业有裕丰面粉厂。它在解放前原是私人合股所办，厂名福义永，股东计有王兰亭、杨梦雄等5户，主要设备有蒸汽锅炉1台，磨粉机5台，生产《华塔》牌面粉，每日产量约300袋，每袋22公斤，正定解放前早已停产。解放后，国家接管了这个企业，经过整顿，添置设备，恢复生产，职工增至47人，日产量最高达到每天700袋。原业主每袋抽取二小两(16两秤)面粉，作为租赁费，每月抽取面粉约二十七、八袋。此外，属于公营的还有裕兴棉织厂，主要织毯子，后来发展为现在的棉纺织厂。1948年石家庄军分区鞋厂也迁来正定，还有正定县纺织合作社，有脚踏铁轮织布机8台，但只开办了半年，因经营亏损停办。这些工业，规模虽小，却是国营工业的幼芽。

私营工业方面，1948年秋由赵庆仲、魏槐轩等人筹集资金，利用城隍庙为厂址，建成了公益制棉厂，以轧花为主。工厂设备有蒸汽锅炉一台，带动轧花机，因系季节性生产，旺季工人多时六、七十人。后来还安装了轧辊，准备榨油，未曾投产，1948年冬魏槐轩等人在西南街开办了一个脱脂棉、绷带厂，1949年初，由卫生部接管，改名卫丰工厂。

正定城的手工业是相当发达的。在铁工业方面，较大的有刘

少亭在胜利街开设的铸锅厂，还有黑白铁、农具制造维修等厂店十几家。木器行有家具、风匣、笼箩、星秤等 50 余家。纺织业有织布、织毛巾、织线毯的小工厂 13 家，拥有织机二十二、三台，从业人员约 80 余人。鞣皮、纺麻等作坊六、七家。酱菜、点心作坊兼设门市的厂家 5 户。酒厂有西烧锅和北烧锅。鞋店成衣局等二十来家。香油坊 3 户。还有修表、理发、照像、刻字、染布、浴池、修理自行车等服务性行业，占用大量从业人员。手工业品中，耿记故献风匣风大省力，经久耐用，质量优越，远近驰名。

商业：解放后国营商业建立了裕民号商店，经理曹显民，以经营粮食、土布、食盐为主。市属企业有正定市合作社，主任王玉海，经营土布粮食等。济民商店，以经营油盐杂货为主，经理陈彦青。这些企业都是刚刚建立，还不能掌握市场。

当时，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流通主要靠集市。私营商业方面以从事粮油行业的户数最多，计有粮店、油店 60 余家，多数以本地交易为主，很少远途运销。土布店是资金最雄厚的行业，日寇投降前，最盛时期开业者 30 多家。解放时，因土布销售受到国民党经济封锁，业务急剧衰落，开业者寥寥无几。解放后逐渐恢复，至 1948 年初，开业者约 10 家左右。正定城又是北方菜籽业的集散地，经营菜籽者，店商 3 家，摆摊 4 家；其贸易范围，远及东北，华南。棉布行业原来比较殷实的店铺有宝和祥、元庆荣等都已衰落；解放初期以金全昌资金较雄厚。由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税捐沉重，业务萧条，不少坐商倒闭。到解放时有些户改为推车摆摊经营，大小棉布业总计 20 来家。百杂货行业，事变前以庆升阁、庆升永、杰德昌等家业务较大，事变后资金转移外地，正定只剩下空架子。全市百货文具行业约有 20 家，杂货业二十五、六家，中药行设有作坊兼营批发零售者有芝兰坊、济和堂等。卖干鲜果品的商贩约 30 来家。开煤店兼营石灰、

磁器的 10 余家。还有酒店、肉店、铁货店等各约五、六家。旅店十二、三家，货栈五、六家。而从业人员最多的要算饮食业了。著名的饭馆有北楼、南楼，具有前堂后灶规模者 30 多家。脊丁、崩肝是正定名产。回民的烧鸡，肉嫩味美，别具风味。各种打烧饼、炸麻糖、卖卷子、饼子的小吃馆共约 80 余家。被誉为正定城三宝的卖扒糕、粉浆、豆腐脑的小贩 30 余家，提篮挑担卖食品的小贩五、六十人。

文化教育工作：解放时有中等学校两所，正定中学和正定师范。正定中学校址在现在的解放街小学和县中医院大院内，原名河北省立第七中学。学制为三三制，设有初中和高中，共 8 个班，其中一个预备班，学生 450 余人。解放前校长赵官果。1947 年 6 月 1 日与正定师范合并，定名为正定联中，此后该校即定 6 月 1 日为校庆日。市长王雅波兼校长，杨惠周任副校长，不久由周学鳌接替，后改为晋察冀边区第四中学。正定师范校址在现在正定中学，原名河北省立第八师范，亦为三三制，前三年为中学部，每年招两个班，共六个班；后三年为后期师范，每年招一班，共三个班。此外还有简师班，学制四年，四个班。全校师生共五百余人。校长彭松年，副校长芦锦堂，两校合并后，芦锦堂任校长。1947 年 7 月中旬我方撤出正定城时，大部教职员及少数学生（四、五十人）随行，经由新乐县转移到无极县南马村一带。回城后，有的学生受战争影响退学，有的参军或参加了工作，学生人数只有二百来人了。此时，新建立一个政训班，宗旨是培训地方干部。1948 年年后，学校恢复发展，规模逐步扩大。

为了培养师资，正定县成立了师范学校，定名为察哈尔省立正定师范学校（当时正定县属察哈尔省北岳区管理），校址在县文庙即现在的招待所内，于 1948 年秋招收第一班学生 50 余人，由华北大学派来教师阎捷欣、王治等任教员。

解放时，城关共有小学 13 所。其中完全小学 4 所，计有第一中心小学、首善小学、普济小学、大佛寺小学。第一中心小学男部校址在现六中处，10 个班，学生 450 人左右，女部在县文庙内，学生 100 余人，校长任勤安，后换为周力健。首善小学分男部和女部，乃天主教会所办，校长法国神甫董振生。男部六个班，学生 300 余人；女部也是六个班，由仁爱会管理，学生 200 余人。私立普济小学，校址在焦家角路西，六个班，学生 300 余人。大佛寺小学，校址在大佛寺东院，共五个班（缺 6 年级），学生 230 余人，校长大和尚纯三。县立女子小学在明伦堂，学生 100 余人。伊斯兰小学，在回民教堂内，四个年级在一个教室授课，学生 50 余人。此外还有东关小学、西关小学、北关小学、西北街小学、西南街小学、县立第二小学、车站小学，学生各三、五十人，教师一、二人。

1947 年解放后，建立了民众教育馆，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内设图书馆，职员 3 人，馆长鲁风，地址在府前街丁字路口东北角，1949 年改为文化馆。解放前剧团都属私营，解放后建立了河北梆子剧团。群众业余戏班有正光剧社，社员 30 余人，经常上演京剧，很受群众欢迎，还到石市、新乐、无极等地演出，培育了一批戏剧工作者。

医疗卫生工作：日伪时期只有一座新民会红十字医院，职工十余人。其余皆为个人行医兼卖药的诊所。解放后，城关共有西医门诊（包括眼科、牙科）22 户，中医（包括针灸）24 人。1948 年，公家成立了群众药社和西医诊所，以后逐渐发展为县医院。

注：作者为无极县人，早年毕业于正定七中，曾先后任正定磷肥厂副厂长、工程师，县政协副主席。

正定城内地下斗争的回忆

李常青

1939年我参加八区区小队之后，藁无县县委书记李斌调我到八专联师学习。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开始，我们八专联师疏散隐蔽。我在无极县北侯村遇到县委组织部长王振海和八专联师校党委书记李石建，他们指示我：此次敌人大“扫荡”一时不会结束，我们各种抗日组织一时也不易恢复，你可到三、八区找县委委员张达风、刘学两同志，在近敌区开展工作，如果找不到，可先回正定老家，等我们派人去和你联系，再安排工作。

于是我连夜往大户村想去我姨母家，但听说村里敌人也安了据点，就在村外窝棚里吃了几个窝窝头，躲了一夜。在此处不能久待。次日夜便又赶到东牛村李小记家。这里有叛徒李小六（李英），原正定县长李尚志也投降了敌人，这里也不能久待。我又跑到楼下村，住在南口儿老贫农刘春锁家，吃了两个高粱面饼子。这里和别处一样残酷，只好钻进青纱帐躲起来，吃生棒子、生瓜菜，雨天躲到破窑里，过了二十多天野人生活，也没和组织取得联系，于是决定回正定城。刘老伯帮我作了简单化装，以赶藁城南孟集为由，混过了层层关卡，当天下午便到了正定北关，找到表哥黄新房和北门里我堂叔，晚上通过北门上伪警备小队长王小六（北门里人），用大绳把我吊上城墙进了城。我搞到了一个“良民证”，有了“护身符”，在城里公开露面了。我六岁时父母双亡，从小在外公家长大，突然露面也不引人注意。过了几天，我便

以生意人身份，骑一辆自行车，在藁无一带到处找组织。几个月后仍无结果，我只得找到过去的战友邢小全一同回正定城合伙干起小买卖来。

10月份的一天，尚铁，尹小红、高铭三同志来到正定。他们和我取得联系，组织决定我们一起开展城工工作，由尚铁统一领导，单线接头联系。12月，县委派李石建同志进城，指示我们要发展地下党员，瓦解敌伪军，收集掌握敌人活动规律的情报，并通过北小屯丁增保同志与上级接头联系。我们的掩护职业是：尚铁当清道夫，高铭三在会友客店当账房先生，尹小红、邢小全在府墙东开了个小饭铺。不久，郭洪深、唐九洲等同志也来到正定。我们在小铺里开会，研究布置工作。

1943年2月，我到北小屯汇报工作，见到了县委张达风、刘学、王振海、李长有等几位领导同志。领导指示我们，要寻机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心脏里开展斗争。当时领导指定我为正定城里内线书记。

回城后，按照县委领导指示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四名党员，团结了四五个积极分子。这些同志经过教育，觉悟提高很快，决心不惜牺牲身家性命，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

巧取情报，痛歼敌寇

1943年，分区司令部情报科王先知同志要我提供日寇驻正定司令部的情报。我把任务下达给新党员穆东来。穆和日本“红部”炊事员刘不止关系不错，刘曾多次为我们提供“红部”的兵种、武器、内部编制等情况。我们多次布置刘和日本士兵交朋友，刘不止也真的和日军一个负责军需工作的军曹交了朋友。

七、八月间，从藁城调来一个日本小队和一部分特务队，又

从辛集调来尾旗中队。他们突然集中正定，显然要有所行动。我立即将这一情报发出去，并让刘不止摸清日军的企图。

刘不止便找那个日本军曹试探。

“你们要开路了吧？我们朋友的干活没有了。”不止拍着他的肩膀表示惋惜地说。

“开路的没有，明天，南城那边的打八路的干活。”日本军曹说。

刘不止手指南门那边说：“南城的干活？”

日军曹用手指指东边：“那边的，那边的，”又在地上写了“南城”两个字，问刘：“你的明白？”刘摇摇头，日军曹用脚擦掉了地上的字，笑笑走了。

刘搞到情报后，挑了一担泔水，装做回家喂猪，把情况告诉了我。我当时分析近处没有南城这个地方，东边是什么地方？很可能是指藁城县南孟据点。南孟北边是梁家庄、寨里一带，这是我们的老根据地，藁无县的领导机关经常在那里活动。我便把情报和分析根据写成材料，乘城门未闭，迅速地送了出去。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一早，敌人到南孟据点附近梁家庄、寨里一带扫荡。这时县委早已有了周密部署，设下埋伏，打得敌人死伤狼藉，装了几大车尸体，狼狈窜回正定城。

这次战斗干掉了多少日伪军，我没搞清楚，只见敌人连夜焚尸，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将尸体焚化完毕。日军大队长拿着被我钢心弹打穿了的钢盔说：“这个，统统地打坏了，八路大大的厉害！”

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

“南孟之战”大大鼓舞了抗日军民，也深深教育了顽伪人员，为开展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正定伪警备队一个中队长叫田福顺，是正定南门里人，在北洋军阀时期和我堂叔一起当过兵，患难中结为金兰之好，他住城内时经常找我堂叔谈心叙旧，我也和他相识了。堂叔趁机亮明了我的身份。我和田谈起了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他不能做对不起国家和民族的事，田表示愿意和我联系。我就乘机把最得力的助手于连生派进了田的部队。

于连生以拉洋车为生，自参加组织以来，每次都能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到田福顺部队后，很快交了不少朋友，不久升任副班长。他利用各种机会巧妙地做士兵的思想工作，宣传抗战，揭露汉奸，将全班士兵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一天晚上，几个汉奸特务在戏院里撒野，于连生和他的士兵们打抱不平，和汉奸们撕打起来，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于连生乘机向戏院门口甩了一颗手榴弹，顿时街上、戏院大乱，戏也搅散了，特务们都吓跑了。于连生等人混在人群中离开了出事地点。一时城内传扬说八路军黑夜进城打游击了，吓得敌伪惶惶不可终日。

有一次于连生带班去路西一个村巡夜，从角落里走出一个人，当即被伪军捉住，这人还带着手枪。于连生过去一看是我们的一个干部叫范黑春。他便上前杵了范黑春一拳说：“干什么的？”范答“老百姓，饭后串串门去。”于说：“吃了饭不老老实实睡觉，胡串游什么？还不快滚你妈的蛋！”范也认出了于连生，便趁势溜走了。这时一个伪军说：“看样子还带着家伙哩。”于训斥道：“少管闲事，看，那边又来人了。”伪军怕碰上八路军，便匆匆走了。

1943年底，田福顺那个中队调到傅家村驻防。日本兵一个小队住在该据点的炮楼里。他们每晚在门口布好地雷，第二天一早，再起雷出操。潜伏在田福顺伪军中的我地下工作人员摸清了

这一规律，便想出一条妙计，趁夜深人静时，在地雷的火环上又挂了一条细细的铁丝，固定好，第二天黎明，鬼子兵集合出操，起雷时，地雷突然爆炸，当场炸死 11 人。而我们的两个内线关系在头天下午就向田福顺请了假，在改好地雷后，便转移了。

第二天，伪军中队副放风说：“头天下午田队长放走两个人，怕与此有关。”田意识到风声不对，就逃到东上泽他岳父家，邀我和我堂叔商量对策。我们便设法把他的家属从据点接回，让他远走高飞了。

此后，于连生也不便继续呆下去，便将他安插在伪治安军警卫连连长刘玉廷部下。

利用矛盾，煞敌凶焰

正定小北门里的“红部”，是日本小林部队屠杀中国人民的魔窟，当时人称“红部”是人进鬼出的“阎王殿”，1943 年，又来了一个名叫赖谷的日本特务，他带着五六个人，又纠集了一批死心塌地为敌效劳的汉奸，组成“赖谷部队”。他比小林更狠毒，在正定、藁城、无极境内，屠杀群众、奸污妇女，无恶不作。

1944 年 3 月，“红部”一名特务在小北门勒索行人，被伪治安军警卫连一个班长和士兵狠揍了一顿。日本宪兵队便把这两名伪军抓进了“红部”。警备队立即给治安军报了信，我们的内线人员火上加油，顿时治安军内沸腾起来，要找日本人算账。伪师长刘化南出面交涉，反被赖谷骂了一通。治安军的日本顾问出面要人，赖谷一口咬定这两个人是“八路”。在这种情况下，警卫连连长刘玉廷带着几十个“知心朋友”，刀出鞘，弹上膛，围住“红部”指名要赖谷出来答话。特务队人少，又都持短枪，哪里是治安军的对手？于是赖谷这个不可一世的魔王只好强作笑脸连赔不是，